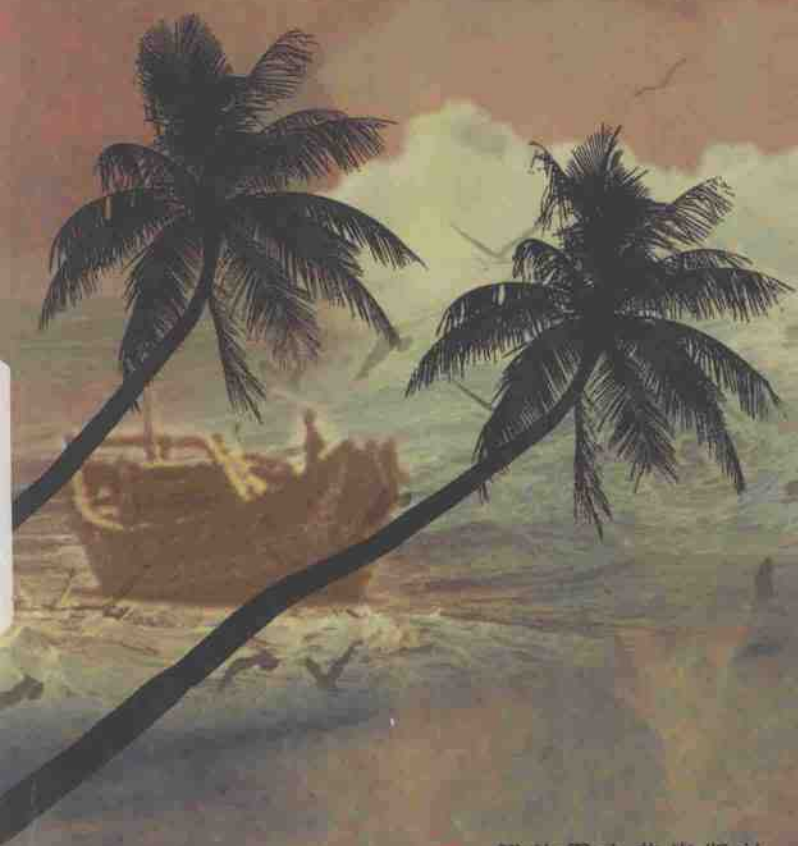


LANGSHIWUYAN WANGSHICHUANG

浪是屋檐网是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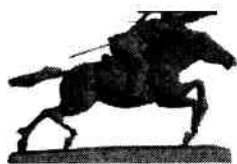
吴之南 /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浪是屋檐网是床

吴之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是屋檐网是床/吴之南著. -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3. 3
ISBN 7-5033-1619-5

I. 浪…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0358 号

书 名:浪是屋檐网是床

作 者:吴之南

责任编辑:刘增新 王 侠

装帧设计:赵光明

责任校对:吴 汇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28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2183683

<http://www.jfwyph.com>

E-mail:jf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开 本:A5

字 数:252千字

印 张:10.125

版 次:2003年5月第1版

印 次:200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3-1619-5/I·1293

定 价:18.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之南无憾(代序)

王传洪

本书作者吴之南同志是我十分敬重的老战友、老同事。他病逝于二〇〇二年六月十日的夜晚,在北京的三〇一医院。医院几天前为他的生命报危之后,我去看过他。彼此都老了,谈话很平静。我问他有什么要向老友交代的,他说了两件事。一是捐献遗体。他一九九二年初,确诊患有恶性淋巴瘤,并且是高恶型、弥漫型的。按医书上的说法,如此严重的病情,一般只能存活六至八个月。但三〇一医院精心组织治疗,突破了这个论断。之南前后做过四十多个疗程的化疗,两个疗程的放疗,四次颌下手术,还有根据病情变化不断增减变换的药物治疗。每一次治疗,医生们都反复斟酌,一丝不苟,力求取得最佳疗效。之南说:我就是在这样的救治下,延长了十年的寿命。我对党和人民,对我们的部队,也对我们医院里的同志们,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我也深信,在我死后,如果医院对我的遗体进行解剖研究,就能对长时期、大剂量的放化疗会对人体的内脏和各种组织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人对放化疗的耐受能力以多少为极限等等问题,总结出一些有用的东西。因此我已经向医院提出了捐献遗体的申请,医院也已经接受了我的申请。既然如此,我死后的遗体告别仪式等等,自然也可以免去了。我要说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完全自愿的,而且也是得到家属同意的,没有任何人来做动员或启发引导之类的工作。以后

如果有必要,请你做一个见证。二是我在退休和得病之后,写了一些东西。散文发表了。还尝试写过长篇小说。一部写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的,没有写成。毕竟我参加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斗争,时间不过一年,生活积累不厚实,原来想得满好的,写起来却捉襟见肘;在政策把握方面,原本好像是懂的,一写才知道只是一知半解。所以这个稿子,只能半途而废了。还有一部是写粤东渔民的,写写改改几年了,现在有了一个还算完整的稿子。本想请你看看,再改一遍。现在不成了。已经和秀云(洪注:秀云姓刘,是之南同志的夫人)商量过,我走后由她作为一份普通投稿,直接交给文艺社。请文艺社不要考虑作者是文艺社老人这一层关系,完全按照作品本身的水平,决定取舍。不先送给你,除了你身体欠佳之外,也包括了这层考虑。之南说过这两件事以后,我说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赞成你的决定。

六月二十五日,之南逝世后十五天,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董保存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之南同志的遗稿,编辑部已经看过,认为是比较好的,可以出版,也应该出版。书稿是作者自己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从头到尾清清楚楚,所有有关海上风浪潮汐、渔民渔事的专用名词,以及一部分广东方言,作者都加了注,编辑也不费事。因为你和作者相熟,我们想请你看一遍原稿,再写一篇序。如果你同意,我近日就将稿子送到你家。

这就是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了:《浪是屋檐网是床》。写序,我不敢当,不是谦虚,是自知写不好。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无论对之南同志,对我和之南两人的老家解放军文艺社,我都说不出推辞的话。我回答保存说,我只能简单地说一点读后感,也给读者介绍一下作者;保存说可以的。

作品很好看。作者设定的故事发生的岁月,是二十世纪的二

三十年代。距今很久远了。但是作品一点不陈旧,不暗淡,反倒有许多新奇和鲜活。特别是作品着重描写的五男四女,九个青年渔民,会使你感到非常亲切,他们的悲欢离合也丝丝缕缕牵动你的心。作品描绘的南海风物,各式渔船,大围捕,小掏海,引鲳入网,人鲨搏击,船覆人亡,劫后再生,以及渔镇渔村坟头多、寡妇多、尼庵多、靓妹多的乡土风貌,海洋捕鱼主力大军“蜆家人”困厄一生的悲惨命运,为你打开一个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世界。这里有惊心动魄,有大悲大喜,也有道不尽的学问和趣味。作者在潮汕驻防十六载,和南海渔民有着长久和深切的交往,才能把海情渔事写得如此引人入胜。

传奇色彩可能是这部作品的最佳特色。目前有些作品津津有味地咀嚼卑琐,这部作品或许可以使你眼前一亮。作者初稿原曾冠名《搏海人传奇》,以后换了书名,而传奇风采依旧。传奇不可不有英雄,英雄必须具有独特个性,所作所为还须不离一个“奇”字。作品主人公麦锦龙侠肝义胆,领袖群伦,搏海可谓大智大勇,无所不能,而于人情世故,则单纯如白纸一张。三闯湾子礁,一闯探险,二闯捕鲳,三闯杀鲨,就极其神奇好看,而且极富人情味。一闯龙崽本拟单舟独干,是奇女子走仔硬赖着非陪他不可,为他准备了吃的喝的,做他的后勤又做他的参谋,他才在礁岩环立,潮涨潮落,恶鲨出没中探出了一条进出百年禁区的惟一可行的路线。回归孤舟中,武打大戏之后又加了一个喜剧小段,走仔主动出击以身相许,龙崽手足无措举手投降,而读者不能不为之粲然。二闯是龙崽巧施引君入瓮之计,鲳鱼习性古怪,喜欢跟人翮作一堆,龙崽命船上男子轮番下海,引鲳入网。龙崽自己下海最多,引来鲳鱼也最多。偏偏拐卡下海之时,一条公子大鲨从海底蹿出,一口咬住拐卡,迅即潜入深海,从此无影无踪。这二闯湾子礁,捕鱼得了万斤丰收,

却折损了一个兄长。龙崽为此深自谴责，只因自己立下规矩，自己并不遵守，下海屡屡超出时限，致使拐卡仿照行事，方罹此难。拐卡死后，其亲弟满卞、义妹冰糖，也因兄长葬身鲨腹，冤仇未报，不能成婚。其中还有许多隐情和衷曲，龙崽木然不知，幸得走仔一一详告。为使拐卡冤仇得报、衷情得偿，也为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于是又有了龙崽三闯湾子礁。如同第一闯，龙崽本不愿走仔同行，不得不说了气话：我要让鲨鱼吞到了肚子里，你还能帮我什么？走仔一急也说出久藏心底的话：你要让鲨吞了，我就跳到海里让鲨把我一起吃了！于是如同第一闯一样，龙崽历尽艰险，费尽心计，走仔吃尽苦头，竭尽全力，两人用大钩钩钓到了这条三丈多长的大鲨，又把钢叉扎进了鲨鱼脑壳，让这条大鲨拖着他们的小舢舨在大海里转圈，整整转了两天一夜，直到把鲨鱼累了个半死，龙崽才把钓钩和渔叉两根绳子一齐收起，走仔则对准鲨鱼脑壳猛击狠砸铁锄头，如此这条海上最凶恶的公子大鲨才告毙命。两人剖开鲨鱼肚子，终于找到了拐卡颈项上的那把长命锁。拐卡魂归故里，满卞和冰糖终于结成夫妻。小说写三闯湾子礁，用了整整三章，比我的复述，要精彩一万倍。我举此一例，不过借此说明，如此这般奇事，以及其他如两姑娘夜半装鬼，吓破渔霸走狗狗胆，龙崽海上漂流万里到暹罗，两年后与走仔人鬼重逢等等，其人其事都极为奇幻神妙；也借此向读者介绍作品中另一英雄人物走仔。走仔是一个孤女，在风吹浪打中顽强长成，如海滩石缝里一株“海豆芽”，极不起眼，却有极强的生命力。她对龙崽的爱是一种在传统或当代作品里难以见到的飞蛾扑火、一往无前的爱，一种不管不顾、不加掩饰的爱，一种明知无望，不移不渝的爱，更是一种极端纯净，不求回报的爱，一种三千度高热，可以熔化铁石的爱。无可讳言，走仔轰轰烈烈的爱情，也是构成作品传奇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作品气象万千,天马行空的传奇色彩之外,作品也有极精确极具科学性的对海洋、对鱼类、对船舶的描写。原稿中夹有一幅作者手绘的盛发号渔船的横剖面图,对三枝桅中的主桅和前后帆,对十个不同用途的舱室,对船老大、管帆缆的配缭、侦察鱼情的渔眼、监管水手的网头,各个摇大橹和小橹的、持抄网拿响器的水手,各在什么位置,都有明确的标示,小说所叙述的全部航海和捕鱼过程,无一不是按此图进行。至于作者对五男四女的不同性情,同一事件发生时各各不同的心理活动,描摹都极为生动,对这些不同心理活动相互间的对照、交错和冲突,也挖掘得极为深刻,使人和事都显得异常真实可信。这种大和小、粗和细、奇幻和精确、大气魄和小细节、写意和工笔的融合,使作品形成了一种很有意思也很好看的格局。毛泽东同志曾倡导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现在少有人说了,我倒觉得之南是仍然朝着这个方向在前进的一个。

之南一九四九年入伍以后,在潮汕地区部队经历各样锻炼,在部队宣传文化工作岗位上担任各种工作。整整十六年,每年两次助民劳动,一次海上练兵,都和海防战士、南海渔民在一起,很能和群众打成一片,很善于从群众斗争中汲取营养。之南自幼爱好文学,从小学到大学,从上学到当兵,一直多读书勤练笔,五十年代后半期和六十年代前半期,写过不少通讯报道和散文,也写过小说。都是反映部队生活的,都很清新,没有陈词滥调。其中六十年代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散文《高原书简》,在社内和军内,都有很好的反响。一九六五年,我所担任的编辑工作,重心转到报告文学,兼顾散文有困难,于是我向主编胡奇同志建议:增补一个编散文的编辑。胡奇同志问我调谁,按照解放军文艺社的老做法,编辑从业余作者中选调,我说吴之南同志如何。胡奇同志高兴地说,这也正

是他所考虑的。随后我们与广州军区商量,得到完全的支持。正好我因开会要去广州,主编胡奇让我当面征询一下之南本人的意见。其实原来我与之南只有疏疏的书信往来,那次在广州是第一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我问之南愿否长期做文学编辑工作,他说他热爱部队也热爱文学,能到《解放军文艺》做编辑,于愿足矣。他愿意在他的后半生,一心一意把这个工作做好。他的态度是极其诚恳的,他以他后来的整个后半生证实了这一点。

由于我有一段时间去农村参加“四清”,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共事的时间,实际上不长。但工作中的互相配合是默契的。譬如当时林彪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几句话:“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几乎是被奉为法典的,在我们的“四好五好征文”中自然就成了主旋律,我们也着力鼓吹。但毕竟长期受党的教育,知道一点实事求是,凡是遇到太过庸俗化和形式主义的,我们就做一点删削修改,或干脆舍而不取。我们相互之间,有时商量一下,有时也并不商量,却总能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以后“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搞你揭发我,我揭发你。再以后,总政治部被打成“阎王殿”,《解放军文艺》被勒令停刊。文学编辑之途并不平坦,之南此时应该有了较深切的体会。但不久之后,大概因为他是初来总政,阎王殿的“鬼气”沾染不多,在停刊后的解放军文艺社,他是在一九七〇年一月,第一个被分配工作的,到当时“军委办事组”直接掌管的军政大学工作。此时凡早早分配,又分配到这样显赫单位的同志,大多面有得色。惟有之南,似乎并不高兴。他找到我说:“有朝一日《解放军文艺》复刊,一定想着我!”我当时自己还不知道发落何处,《解放军文艺》复刊的事根本想不到,但他的嘱托,因其突兀,是记住了的。大约过了一年半,“九一三”过后,李德生主任正式决定立即筹备《解放军文艺》复刊,我如

约打电话告诉他。他大喜说：“我要求归队！”我对此很高兴，但是觉得不能不提醒他，他现在在军大担任学员队副政委，是师一级职务，如果回到文艺社，大约会担任编辑组长，则是团一级的职务，按军队规矩说，这实际上等于降了一级。我劝他在这个问题上考虑明白。哪里知道，他似乎并不考虑就明白了，他在电话里明确地回答了我：“请老领导老同志放心，我不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不考虑，将来也不考虑。”他跟我说过后，大约心里还不够踏实，接着又给胡奇同志等打了电话，重申这个态度。

之南很快回来了，担任小说编辑组组长。工作是很努力的。由于当时依然是“四人帮”统治文艺，干出多大成绩不敢说，但至少他编发的作品，“帮气”要少得多，军内外都有好的反响。关于那个在“降级”问题上，他所作的一点小小牺牲，他归队后几十年没有提过一个字。直到他逝世前夕，在我前面提过的那次谈话中，我就此事向他表示了敬意，他有点意外地说：“我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只是没有觉得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有多么重要。”这就是数十年一贯的之南，眼下人们闲谈中不时出现的“仕途”一词，之南从青年、中年到老年，都是看得很轻很淡的。而文学编辑事业，则在他心中占着极重的位置。

七十年代的工作，也还是颇多荆棘。风风雨雨，沟沟坎坎。他先是对作品中鼓吹“一把火烧红世界”、“造反派脾气”的倾向颇多警觉，也得罪了一些人。最严重的是一九七六年，此时“四人帮”为了搞乱军队，在政治上提出“揪出军内一小撮”，在文艺上则提出“大写军内走资派”的口号。提口号的是“四人帮”，当然是政治阴谋，是心怀叵测，但是跟着叫的也有一些是自己同志，他们以为这还是什么文艺创作要揭示矛盾，要反对无冲突论的老话题，也跟着瞎起哄，这就形成了一种相当严重的内外压力，而承受压力最重的

同志中,就有一个之南。他是小说组长,此类作品要走向军队、走向社会,遇到的第一道关卡,就是他。由于他把关甚严,他也因此受到了最多的非议和责难。此时我已调出文艺社,但还在一个楼内办公,文艺社的情况仍然知道一二。社长胡奇同志跟我说,素来温文尔雅之南,有一次竟流着眼泪向他甩了“纱帽”：“我不干了！我不能用我的手去自毁长城！”胡奇同志向我谈到此事的时候，自己也很激愤，他说他这样回答了之南：我们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不就是打倒再打倒嘛！胡奇跟我说：“这就是我和吴之南的攻守同盟了。”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和教育是很大的。它使我震惊：这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啊，一个热爱部队热爱文学的同志，竟然发出了不干部队文学编辑的喊声！它也使我感佩。这个之南，此时此地喊出“我不干了”，是撼动了我的心的。我知道，这不是表明他对文学编辑生涯的厌弃，而是表明了他真正地热爱部队热爱文学，真正地珍视和坚守《解放军文艺》这个岗位，他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原则，有操守，党性很强的文学编辑。我应该向他学习。

好在之南这一声喊出之后不久，“四人帮”粉碎了。之南又开始了默默的，勤奋的工作。一九七八年六月，他被任命为解放军文艺社的副社长，主持《解放军文艺》月刊的编辑工作。作为部队文学刊物的主编，他在两个主要方面都做得很好：一是坚持为巩固和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一是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而上学看，这两者似乎难以统一，而之南就是在这两者的统一上，作了不懈的，而且是卓有成效的努力。他咬定“战斗力标准”不放松，是很多同志都知道的。但是他在不断深化自己对这个标准的理解，力求做到不片面、不僵化，他多少年来一直领着一一些编辑和作者在探索一条更加广阔的军事题材文学之路，并不一定大家都知道。其

实他的视野、思路和实践,都是不断在开拓着。在小说深刻反映军队向前进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方面,在报告文学拓宽题材到军外甚至国外方面,在诗歌散文的愉悦作用方面,在我一九八二年回到文艺社再次与他共事以后,他和我多次谈过他在这些方面的许多思考。当然,在说到实践和实践的成果时,他几乎不谈自己,只谈有关的编辑和有关的作者。

至于他对部队作者的热心扶助、友好支持,或许只要看看他八十年代前期为部队作家权延赤、张俊南、徐军等几位同志的作品集所写的序言,就可以知道个大概。这三篇序都不是应酬之作,是中肯地谈得失,平等地论短长,每一篇都提出一个或几个可供作者和读者深思的问题。谈权延赤的中篇《第三代开天人》,之南着重谈了广大读者和作者都非常关注的军事题材文学塑造改革者形象的问题,热情地肯定了权延赤的勇敢实践。谈张俊南的作品,之南赞扬其作品的“品位儿正”。还说:“文可以载道,但也可以不载道,齐白石的虾米那样的文章也是很好的。但不载道不等于可以搞歪的斜的,搞诲淫诲盗。”这个意思当时是有前瞻性的,得到了很多作者读者的赞同。谈徐军的作品,之南赞扬徐军熟知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包括某些陋风恶俗,但“从来不以这些猎奇的东西装点自己的作品”,也是很好的。之南长期做文学编辑,但是并不很认同这个工作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说法,他说编者作者都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何必把“你我他”分得那么清,撒那些“小家子气”呢。

一九八六年我们同时退休。我入伍时间略早,是离休;之南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广西解放时入伍,差两个月不够离休,是退休。退休和离休,生活待遇有些不同,连居住也不在一个大院了。我想安慰他两句,又不知说什么好,他却笑着帮我说了:总要划道杠的嘛,这道杠划在一九四九年“十一”建国之日,是恰当不过的了。我

没有什么不痛快的,你放心!这是的确的,他的精神状态很好。我退下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点没着没落的,他好像并没有这样一个过渡阶段,仿佛只是转移了一个阵地,又在准备投入新的战斗了。

之南从一九六五年调到解放军文艺社,到一九八六年退休,大约干了二十年的文学编辑。他有生活积累,有写作才能,也有创作愿望,但是二十年中除了奉命写一些评论性文字之外,再没有写其他可以称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有一个时期,文艺社编辑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有同志把这叫做“创作假”,也有同志用来治病休养。之南则经常是下部队体验生活,以求始终保持一种和部队干部战士的精神联系,而这归根结底也还是为了做好编辑工作。现在他脱离编辑工作岗位了,有了足够的完整的时间了,似乎可以写他胸中蓄积已久的长篇小说了。我曾这样问过他,他说不,他要趁自己身体还好,腿脚还健,到他本来就比较熟悉的南方走走,写点散文,为改革开放鼓与呼。

这就有了之南一九八七年的海南之行,有了他一九八八年我称之为“文学性调查研究报告”的《酌古斟今话海南》。全文十万字。这实在是一篇奇文。作者自称“三杂”。有见辄记,有闻随录,有感即发,杂陈所见所闻所感,谓之一杂。集游记、政论、读书笔记于一体,谓之二杂。融知识、趣味、思想于一炉,谓之三杂。杂则杂矣,读之若一气呵成,浑然天成。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一腔欢呼改革开放之情,跃动于全文。一个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老军人,一个浏览过大量典籍的读书人,一个数十年虽未从政却也历尽沧桑的过来人,在遍游海南全岛之后,不仅留下了许多观感,发出了许多感慨,还经过反复掂量、仔细斟酌,提出了许多“为知者抛引玉之砖,为识者鸣开道之锣”的,旧时大概会被称为“策论”的建议。在我看来,其整体构思对党的改革开放方针,对特区政策,有深刻独

到的理解,其每一条建议又都是言之有物,既切合时宜也切中时弊,既有远见又有很强的实践性,是可以称之为真知灼见的。当然,之南毕竟是“文化人”,意见中恐怕难免有一点呆气;但是,我想如果他的种种建议,十条中能有一条被海南特区的同志们所采纳,那作用和意义,也就不可估量了。而这也必定就是之南写作此文的初衷吧。

解放军文艺社先后曾有两位编辑,写过关于海南岛的长篇散文。一篇是五十年代陈窗同志的《海南岛散记》,在全国有比较大的影响,被编入各种文集。另一篇就是八十年代吴之南同志的这一篇,有比较重的分量,文采也好,但影响却似乎不很大。我想这与文章没有首先发表在全国性期刊上,之南自己向来不张扬,又不愿别人为之张扬有关。本来可能激起一片浪花的一块石头,竟默默地沉底了。我想在这里做一点弥补,顺手做一个小广告:吴之南同志这篇长文以后改题为《浪踪云影》,收在一九九三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吴之南散文选”中,同志们若有兴趣可以找来一读,读后当知我所言不虚。

就在我刚刚提到的“吴之南散文选”中,还收入了之南一九九〇年完稿的另一篇长文《汕头特区行》,文章的深刻性似略逊于《酌古斟今话海南》,但也是很好的。我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在这两篇专为改革开放、为特区鼓与呼的散文中,之南和许许多多写特区的通讯、报告文学、散文的重要不同点之一是,之南在写特区的时候,从来没有忘记了写国防写解放军。特区虽特,国防则一。在《汕头特区行》里,之南专门为汕头特区南海前哨南澎岛守军“南澎守备队”写了一章,题为《南天一柱》,可以说是全文中最精彩的一章。这一章把南澎战士最爱唱的这支歌:“朋友来了,有好酒;倘若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把这支歌唱出的战斗精神,写了个

淋漓尽致。《酌古斟今话海南》文中，之南的最后一章题为《富岛和强兵》，论述了“建设海南，还有一个巩固国防的重大任务”。《尾声》中则用陈毅元帅《赣南游击词》的格式，写诗九首，其中第八首是这样的：“海南好，海防第一线，铁鹰蓝鲸待命发，山中神箭时在弦，巨舰枕戈眠。军心民心似水乳，共建共保新海南，知兵非好战。”之南三十年前有言：“我热爱部队热爱文学”，三十年后再读他写特区的文章，我依旧看到了他热爱部队关注国防的拳拳之心，不能不为之深深感动。

就在这本《浪踪云影——吴之南散文选》“后记”的最后一页最后一行，之南写下了这样一行小字：“于一九九二年十月与恶疾鏖战之暇”，透露了他已身患绝症的信息。他的病来得很突然，开始是颌下鼓起几个包，他自己和大家都没有太在意，只有当时也因血液病住院，多年前已逝世的我们另一位老战友老同事张忠同志跟我说：“我看之南的病不太好，要千万注意！”医院决定立即切除并探查，当即查明是恶性淋巴瘤。这是一九九二年的二月。从此时起，之南就开始了与恶疾的鏖战。之南的疾病所强加于他的严重痛苦，他自己是从来不说。我去看他，他只是指着颌下的一个个肿块，苦笑着说：“看我脖子上挂的这一串土豆项链！”再痛再苦，他不卧床会见来探望他的同志，总是着装整齐，端坐沙发，轻声慢语和人交谈。以后他夫人刘秀云同志告诉我们，其实他此时全身淋巴结肿大，经常是高烧40℃。每次吃完退烧药就出一身汗，衣服、被褥、枕头全湿透。退烧后两小时，寒颤又开始，上下牙撞击得格格响，连床也一起抖动。病魔就这样来回折腾，体重平均每天减五斤。刘秀云看他太痛苦，在一旁落泪，之南反过来安慰她：没有什么，这个高峰期会过去的，我会好起来的。

就在这个之南叫做“鏖战期”或“高峰期”的一九九二年，之南

还抽“与恶疾鏖战之暇”，做了几件事。一是整理自己的散文选集，为了精益求精，对《酌古斟今话海南》文中的几个章节，几乎做了重写。二是重病确诊之前，作为特约编审，他为文艺社看着两部书稿，确诊以后，社里不愿给他加重负担，和他商量是否把两部稿子拿回去，他说看稿是他与病魔斗争的一个方面，坚持在二十天里看完了九十万字，并且详详细细用书面陈述了自己的审读意见。三是他知道以后不可能再像前几年那样到北京以外的部队或地方去游历或采访了。埋头伏案写字也有许多难处，于是开始自学电脑打字。自己动手用纸板做了一个模拟键盘，在“与恶疾鏖战之暇”，就练习“五笔字型输入法”，在自制的“键盘”上不断敲击。就这样，之南在做各种治疗的同时，完成了这些工作，度过了对他来说是生死搏斗的一九九二年。

进入一九九三年后，发烧次数有所减少，烧起来也不像以前那样高，似乎“高峰期”已经过去。但一次一次化疗过后，脸浮肿了，皮肤变黑变黄了，头发几乎掉光了，视力下降了，肌肉萎缩了。痛仍然是经常的，不固定在一个点上，头、胸、腰、腿都痛，这种痛不像利刃割肉，不像烈火烧灼，倒像毒蛇在体内游走啮嚼，是一种说不出道不明，叫人恶心欲吐，简直不想活的痛。一般止痛药止不住，杜冷丁、M99，或易上瘾，或价昂贵，之南不肯用。于是通常是硬顶着，干拖着。晚上痛得不能睡，就背诵唐诗宋词，背诵世界各国首都名，背诵五笔字型字根及二级简码，以此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冲淡自己的痛感。

做化疗放疗必须住院，十年中仅化疗一项，他就做过四十多个疗程，住院的次数总在五十次左右吧。住院，他总是不太主动，经常要科主任、主治医生打电话催他。医生、护士、同科的病人都把之南当朋友，当政治指导员，当生活顾问。山东农村一个患白血病

的八九岁孩子，病很重，家里请不起护工，白天父母来照看他，晚上家属不能留病房，同病房的“吴爷爷”就担起了守护的责任。以后这个孩子在山东老家去世了，病情危重时还惦记北京的“吴爷爷”，孩子的母亲在孩子走后亲手做了一双极好的棉鞋给之南寄来，替自己的儿子表达了感念的心意。一个农村老人，大之南六岁，两人同病相怜，很谈得来，吃西瓜老人要切下最中心最厚的一块瓜瓢，盛在碗里，送给之南；老人爱吃猪头肉，之南让家人买来送给老人。有关治病的问题，老人最听从的是之南的建议。十年中，之南在医院里，倾心相交了许多朋友，有试飞员，有企业家，当然更多的是部队干部。

一九九三年，之南的老朋友，青年、中年都在西藏度过的部队女诗人杨星火同志的儿子，一位在清华大学搞科研的计算机专家，用之南刚刚拿到的稿费五千元，为之南组装了一台性能相当优越的电脑。从此，之南在医院用笔写字，在家里则用电脑打字，开始写长篇小说。先是写西藏平叛的长篇小说，未成；以后就是这部《浪是屋檐网是床》。一稿，二稿，三稿，至少三易其稿。此外还有许许多多片断，像是构成这部长篇的各种元件，有的用了，有的没有用。这些之南用他病弱的手，一字一字，一行一行，一页一页打出来的原稿，其总字数当在一百万以上。

读完《浪是屋檐网是床》，读者大概都可以看出，作品虽然是完整的，但是远未写完。这很可能是一部百万字长篇的第一部，好戏还在后头。作者在《浪是屋檐网是床》的结尾处，也做了这样的告白：“至于以后，他们怎样跟麦老板打交道，这条船能不能归到他们名下；这四对年轻夫妻，以后又怎样相处，他们还经历了一些什么险关和苦难……这都是以后的事了。那是另外一部书要写的内容。”这就是说，作者把悬念留给了我们，也预告了他还将写“另一